

从文化经典中悟出教育的真谛

高明宇



高明宇 沈阳药科大学党委书记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个追求进步的人不可能离开各类书籍的滋养，阅读可以开阔视野，增加知识，提高思维能力。我读过很多书，有古籍，有小说传记类书，也有专业书。对我帮助最大、我最喜欢的三本书是：《庄子》《西行漫记》和《平凡的世界》。

如果说很多传统文化经典著作都有短小精悍的特点，那么《庄子》却是一个异类。全部的“内篇”“外篇”“杂篇”加在一起，大概有8万字左右，外加行文多是南方楚地的语言，所以读《庄子》最大的障碍在文字。范曾先生曾说，《庄子》里他不认识的字是200多。王蒙谦虚地说，如果范曾先生不认识的字有200多个，那我就有300多个。

不过不认识字并不影响我了解《庄子》，喜欢《庄子》，我读《庄子》也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喜欢里面丰富奇特、无与伦比的想象。这些瑰丽的想象总能帮助我

超越现实的烦恼，看得更远、想得更透。就像大多数人知晓的《逍遥游》篇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如果见到这么大的鸟，你还会将麻雀、老鹰放在眼里吗？像《秋水》篇讲：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那么，我们不是要反思，自己是不是井蛙、夏虫或曲士呢？像《外物》篇讲：负有重任的人必须要有大志。有个任公子要钓大鱼，用50头牛做钓饵，蹲在会稽山上，鱼竿投到东海，就算一整年钓不上一条鱼也不打紧。一旦鱼上钩，则“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顿岸千里”。

《庄子》想象力之奔逸无与伦比，读后让我神清气爽、耳目一新。很多时候，我在工作中遇到了困难，就翻一翻《庄子》，跳出思维的局限，从更高的视角看问题，很多问题也就这样找到破解之法。

《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作者为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报道作品，介绍了红军革命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准确、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斗争历程。

初读这本书是在大学期间，我对书中描写的游击战非常感兴趣，很想了解红军是怎么运用游击战来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比如有一条原则是：在交战之前，不论主动或是被动，必须制订出缜密的详细的进攻计划和撤退计划。任何进

攻，事先如不充分准备好预防措施，遭到敌人突袭时就会猝不及防。游击队的极大有利条件就是优势运动能力，在运用这种能力方面如有错误就意味着灭亡。在这一原则的影响下，我做任何事情都是谋定而后动，行动之前必须制定详细的方案并反复论证，实施之后的结果往往也是水银泻地、一气呵成。还有一条原则是：在与敌军正常交战时，游击队的人数必须超过敌人。但是如果遇到敌人正规军在移动、休整或防范不严的时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队，对敌人战线上的要害进行侧翼奇袭，行动要迅速坚决。红军的许多“短促突击”都是用几百个人的兵力对成千上万的敌军进行的。这种突然进攻要完全成功必须要迅速、勇敢、果断、计划周密，挑选的是敌人最薄弱又最重要的环节。根据这条原则我悟出一个道理，貌似强大的困难，其实并不是无懈可击、不可战胜的，一定能够找到其弱点并实施打击。

《平凡的世界》是我参加工作后读到的一部文学巨著，多年来一直珍藏在我的书架上。该书以黄土高原为背景，讲述了孙少安、孙少平两兄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奋斗历程。这部作品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是激励中国万千青年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不朽经典。路遥用他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展现了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成长，以不屈昂扬的姿态散发着点点微光，给予了年轻时候的我深刻的精神启示，并渗透到我的心灵深处。后来，我又重读了这部经典，内心仍然激荡不已，同时也有了一

些新的感悟。

小说中孙少平在矿井下的身影，让我想起改革开放初期那些在物资匮乏中依然追求精神富足的青年学子。作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一分子，我深知理想主义光芒对青年心灵塑造的决定性作用。路遥笔下的人物从不回避生活的艰辛，却在苦难中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对尊严的坚守。这种精神品格，正是我们高等教育应当传承的宝贵基因。孙少安扎根乡土的担当与孙少平走向城市的勇气，构成了那个变革时代青年选择的完整图景。路遥通过这两个性格迥异却同样可敬的形象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不是制造标准件，而是帮助每个年轻人发现自己的生命坐标。作品中金波对藏族姑娘的纯真爱情、田晓霞超越阶层的理想主义情谊，这些超越物质的精神联结，在物质丰裕的今天更显得珍贵，守护好人性中美好的品质。路遥笔下那些平凡中的伟大瞬间，恰是抵御时代浮躁的一剂良药。

重读这部经典，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是从医还是从教，其本质都是对生命的守护与尊重。《平凡的世界》告诉我们，伟大出自平凡，奋斗成就人生。在这个科技迭代加速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从这部作品中汲取力量——教育的真谛，不在于培养多少杰出人才，还在于让每个平凡的生命都能绽放应有的光彩。

岁月之书

辽宁省第十四届全民读书节特别报道

千年国宝的烽火长征

姜苒苒

章剑华的《故宫叙事：百年国宝传奇》(以下简称《故宫叙事》)新近出版。章剑华以恢宏的笔触再现了故宫文物在抗战烽火中万里迁徙的壮举。他的《故宫三部曲》不仅填补了“文化抗战”史料的空白，更以文学化的叙事重构民族危亡之际知识分子守护文明火种的史诗。

《故宫叙事》的核心立意超越了单纯的文物迁徙史，而是将国宝升华为中华文明命脉的象征。故宫文物南迁是“世界战争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文物迁徙”，其本质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保卫战。当日军铁蹄逼近北平，故宫人毅然将13427箱文物分5批南迁。这一抉择被赋予“文化抗日”的崇高意义——文物存亡直接关联民族精神的存续。正如《故宫三部曲》之一的《承载》书中记录，马衡院长的疾呼“文物在人在，文物亡人亡！”守护国宝即守护文明的火种。书中还描述了沿途军民自发护宝的细节：贵州百姓腾出宗祠存放文物，安顺乡民在华严洞日夜巡逻，贵阳书画展上万人争睹国宝。这些

场景揭示了一个深刻命题：文物守护不仅是精英行动，更是全民抗战的壮烈历程。

抗战时期的文物迁徙构成《承载》全书高潮，作者通过“空间流转”与“人性淬炼”两条线索展开叙事。万里迁徙是一场生死考验，经历了三路西迁的艰险。1937年南京告急，文物分南、中、北三路向西南转移。南路80箱精品绕道湘桂黔，躲过长沙轰炸；北路7286箱穿越秦岭险道；中路9369箱溯长江而上，遭遇土匪劫掠、日军空袭。作者以地理空间为轴，以人物路线与抗战战场叠合，凸显“文化长征”的悲壮。书中专章记述安顺华严洞作为文物庇护所的6年时光。洞中木构库房“仿正仓院而建”，当地军民与故宫人共同守卫毛公鼎、散氏盘等1022件瑰宝。这一细节成为战时中国文化保护智慧的缩影。自然洞窟的恒温防潮特性被极致利用，而洞口古庙的隐蔽性更体现乱世中的生存策略。

守宝人的群像书中化身为精神图谱，作者拒绝简单的脸谱化描写，转而刻画知识分子的执着坚守。马衡作为

当年故宫院长，在太和殿接收仪式上痛陈日军罪状。庄尚严为打劫唐代石鼓，以浸湿高丽纸覆于麻辫缠裹，终令千年石皮完好无损。欧阳道达推行“牌子管理法”，扛箱工凭牌交接文物，10年运输零事故。这些细节揭示了奇迹背后的制度严谨与工匠精神。

在艺术手法上，章剑华进行了纪实文学的突破与重构。作者采用“以文证史”的创作策略，在史料匮乏处引入文学想象，形成多重突破。全书以时间线为经(1933年至1948年)，以人物命运为纬，将宏大叙事与个体经验交融呈现。如周若愚思与高茂宽的战地爱情穿插于文物转运间隙，既软化历史厚重感，又展现了一代青年的家国抉择。

文物不仅是客体，更是历史见证者。书中的器物叙事具有象征性。西周铜鼎分离2800年后，竟在贵州山村因老乡捐宝而重逢。这一情节暗喻文明血脉终将归流，赋予历史以光芒。书中对重庆书画展与贵阳特展的描写极具画面感——1944年贵州省立艺术馆内，黄庭坚《松风阁诗》、赵孟

頫《鹊华秋色图》首次公展，民众“熙来攘往，络绎不绝”。展览被赋予双重意义：既为振奋抗战民心，亦为在西南播撒文化火种。

作为全景式记录文物南迁的作品，《故宫叙事》的贡献已超文学范畴。书中首次披露南京沦陷区文物的去向——日军劫掠的2273箱故宫文物移交汪伪政权，战后封存清点追回。这一细节修正了“文物零损失”的简化叙事，直面历史的复杂性。故宫人创立的“四层包装法”(纸、棉、草、箱)、“晾晒责任制”等保护规范，至今仍为文物运输的基准。书中对管理流程的还原(如每箱文物需经记录、审核、监理等五人签字)，为现代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范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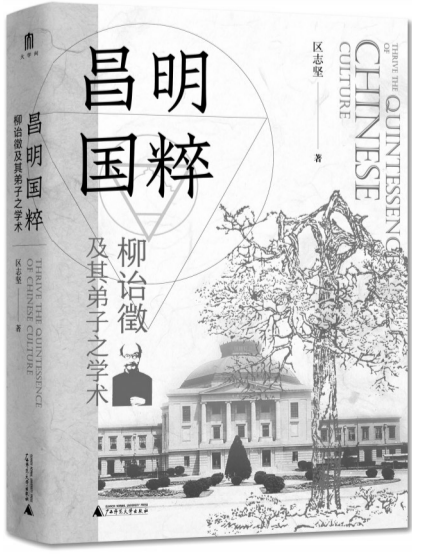
战火中的文物守护，本质是文明对野蛮的抵抗。当故宫人抱着“文物亡人亡”的信念穿越两万里山河时，在烽火中珍视本民族的文明，他们守护的不仅是器物，更是民族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尊严。章剑华以饱含温度的笔触，将这段尘封的历史转化为一部“文化抗战启示录”。

星火南高与文化守护的另一种可能

华筠

提示

在五卅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高)悄然聚集了一批学者，他们以守护文化命脉为己任，开创了一条中西融通的学术道路。区志坚教授积20年之功完成的《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首次系统剖析了以柳诒徵为核心的南高史学群体，填补了民国学术史的关键空白。这部著作不仅还原了以礼释史的学术传统，更揭示了中国史学现代化进程中坚守与创新的辩证关系。



1922年1月，《学衡》杂志创刊号刊发了柳诒徵撰写的发刊词，旗帜鲜明地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这一宣言标志着南高学派在思想界的正式登场。

在当时北大新文化派如日中天的背景下，南高史地部师生以《学衡》《史地学报》《史学杂志》为阵地，形成了新的学术力量，时称“北有北大，南有南高”。

在五卅反传统浪潮中，南高学派展现出独特立场。反对全盘否定传统，柳诒徵在《论近人讲诸子学者之失》中批评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的研究“逞其臆见”“多主观”。他们质疑疑古史学，认为顾颉刚的疑古运动“批判古史过头”。他们坚守文化本位，提出“吾国以礼为核心之史”的核心理念，将礼视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核心。这种“以礼释史”的立场并非保守封闭，而是在深刻理解中西文化基础上的理性选择。柳诒徵在美国人类学学者白璧德思想影响下，提出建立“新古典文化”的构想，既守护“礼”之文化命脉，又倡言“融化世界新知”。

柳诒徵的学术体系以“以礼释史”为轴心，这一思想在其代表作《国史要义》和《中国文化史》中得到系统阐述。中华民族“尚德、尚礼”的性格源于礼教实践，如唐虞二帝“就人性和平，立礼仪，使民回复‘中道’”。柳诒徵将史学定义为双重结构：狭义史学即“一切书籍文牒，其目录家所列史部诸书”，是记载人类活动经历的文献；广义史学即“凡属人类过去之思想言论事实记载，皆在历史学范围之内”，是探究人类过去的研究方法。

历史研究既要探求“人类进化的通则”，又要寻求民族“独造之真”。柳诒徵的文化史观强调通史与独造的统一。柳诒徵的学术大厦，以“以礼释史”为基石，在其扛鼎之作《国史要义》与《中国文化史》中巍然矗立。他将史学视为双重结构：记载过往的文献(狭义)与研究过去的方法(广义)。而其最精微的洞见，在于从四重维度揭示“礼”与“史”的共生关系：史官制度与礼官同源，皆源于记录与规范的

双重职责，使史学天然承载“资治”功能；史书笔法则以“礼”为绳墨，无论是《春秋》的微言大义，还是《史记》的褒贬进退，皆在确立垂范千古的准则；浩繁史籍本身即是“礼”的载体，详述伦序，规范社会；而绵延千载的民间礼俗实践，则塑造了中华民族“尚德尚礼”的独特民族性。柳诒徵洞察到“中国文化的伟大是建立在重视个人自由上的”，古代政治中已蕴藏着民主与忠孝精神的萌芽。这一论断，超越了简单的中西、古今二元对立，展现了他对传统资源进行现代阐释的卓越能力，这无疑是对当时盛行的线性进化史观的有力矫正，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张目。

南高史学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柳诒徵的原创思想，更在于其弟子群体的传承与突破。区志坚通过深入分析四位核心弟子的学术路径，展示了南高学派的丰富面向。缪凤林以文化分期重构中国历史演进，在《中国通史纲要》等著作中展现了通史编纂的深厚功力；郑鹤声则专注于中国史学史与历史教育，建立起系统的方法论，其《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历史教学法》影响深远；陈训慈在地方学术史与西方史学引介方面卓有建树，他坦言西学考古发掘对古史重建的贡献，体现了学派内部的开放心态；而张其昀则另辟蹊径，开创“史地通轨”的研究方法，成为现代人文地理学与地理教育的奠基人。这一群星璀璨的景象，恰恰映射出中国现代学术走向专业化的历史进程。从早期南高“史地研究会”的史地交融，到后来中央大学时期史、地学科的明确分野，清晰勾勒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科体系转型的轨迹。弟子们对师说的继承并非亦步亦趋，如陈训慈对西方新史学(鲁滨孙理论)的接纳，张其昀对地理学独立的追求，都展现了创造性转化。这种“和而不同”，避免了学派陷入

僵化的文化保守主义。

区志坚所著《昌明国粹：柳诒徵及其弟子之学术》的价值，远不止于为一段被遗忘的学术正名，它点亮了一盏由理性、坚守与开放共同发光的精神灯盏。柳诒徵及其弟子们，是文化长夜中清醒的“守夜人”。他们在传统与现代的巨大裂谷间，以学术为桥，试图沟通古今，融汇中西。其探索虽历经坎坷甚至被遮蔽，却越发彰显其独特的启示意义。南高学派所代表的这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之路，今天依然是一座蕴藏丰富、值得深掘的思想富矿，为我们正在喧嚣中守护文脉、在开放中确立自我，提供了不竭的精神源泉与深邃的历史镜鉴。作者通过系统梳理《史地学报》《学衡》《史学杂志》等原始文献，细致勾勒出生师交往网，有力还原了民国时期南高学术双峰并峙的真实图景，证明南高学派绝非历史的注脚，而是“新史学”演进中不可或缺、充满活力的一翼，彰显了文化守护的现代价值与精神风骨。

柳诒徵及其团队对文化信仰的践行，迸发出耀眼的人格光辉。区志坚的研究方法亦值得称道。他巧妙地将机构变迁(南高—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与思想演进相结合，深入挖掘南京图书馆藏柳诒徵《东亚各国史》、台湾罗刚纪念馆藏缪凤林《中国礼俗史》等罕见史料，并重建了南高留美学人(如吴宓、梅光迪)与本土学者(柳诒徵)之间的跨国思想网络。书中对柳诒徵晚年思想的发掘尤为珍贵。1951年他在家书中坦言：“我数十年来，能以日学贯通科学方法，乃是与许多留学生相处，得益处。中国老先生没有科学头脑，故而思想落伍。”这一自白，彻底颠覆了将其简单归为“守旧派”的刻板印象，鲜活地呈现了其思想中“古今融汇、中西涵化”的复杂性开放性。

读到

AI时代的艺术与游戏

李海卉

游戏是什么？文化史学家赫伊津哈把人类的行为都定义为游戏，“游戏比文明更古老、更原始，文明在其最初阶段都是一场游戏。”

游戏玩家不是被动的消费者，而是艺术作品的联合创作者。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文化的游戏要素研究》一书中，阐述游戏在构筑虚拟世界这一点上，与宗教、艺术并没有什么区别，其认为文明就产生于游戏的行为之中。游戏的高互动性、过程的高参与感、不同的角色扮演，比其他艺术形式让人更直接地获得体验感，从而以新的视角去反思自我与世界。赫伊津哈还在书中描述了中国古代战争中的仪式感：大战在即，将军却悠然教着敌军的栅栏，秦晋之战中“清明日交锋”的典雅战书，展现了游戏精神如何将暴力转化为文明。赫伊津哈在书中给人们敲响警钟：“当游戏精神消亡，文明将沦为机械流程。”

许煜在《在机器的边界思考》中预言：“算法正把创造力变成可计算的概率游戏。”当AI生成的“人工艺术”甚至比画家的作品更受欢迎时，我们发现，算法几乎在接管我们的审美选择。“您的凡·高风格日出画已生成，耗时3.2秒。”AI绘画程序是完美模仿大师笔触，越暴露出其本质是超级拼图游戏。它能重组30万张星空图的碎片，却不懂凡·高在写给奥信中写“星辰是活着的火球”时的战栗。许煜在书中冷峻指出：算法的核心是预测性“它要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以及你周遭的世界”，而人的自我选择可能被系统性的支配所吞噬，人工智能正在以效率之名蚕食创造领域。

艺术家该如何在机器的边界重获创作的个性？人类的创造又该如何不被算法同化？

当人们将“人工艺术”误认为是艺术创造时，数据中的神经网络无法理解莫奈的睡莲承载着光的哲学，八大山人的残山剩水暗藏着家国伤痛。算法可以模仿笔触，却无法复制一个灵魂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震颤。艺术家对AI的运用不应仅是顺应，而应是迎接挑战，通过不断的质疑在AI系统内植入异质性的种子。

在算法的游乐场里，不妨做个任性的孩子。在AI宣称要接管想象力时，艺术家的使命或许不是创作杰作，而是守护人类可以肆意玩耍的游乐场。“游戏最珍贵的特质，是明知假戏却甘愿认真的矛盾性。”赫伊津哈揭示游戏本质：“它创造临时性的新秩序，又随时准备打破它。”这种“自愿被欺骗”的悖论，恰是艺术家对抗AI的秘密武器。艺术家最有力的反抗或许是认真地当个“搅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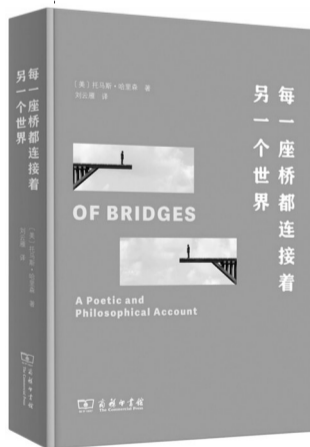
或许人工智能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人类会创造这种注定会消逝的游戏。算法能解析《富春山居图》每处笔触的数学向量，却算不出黄公望在江边枯坐四年时，看着山岚聚散体悟到的“无用的永恒”。

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在故宫修复文物的老师傅，文物之所以能够留存千年，靠的是一代代修复人为之“续命”。这种固执的坚守，恰如赫伊津哈写下的箴言：“文明存续的关键，不在于我们能多精确地计算世界，而在于我们多珍视那些算不清的事物。”

也许艺术家们堆砌的沙堡终将被潮水带走，但沙滩上那些歪扭的脚印，才是人类不可复制的灵魂签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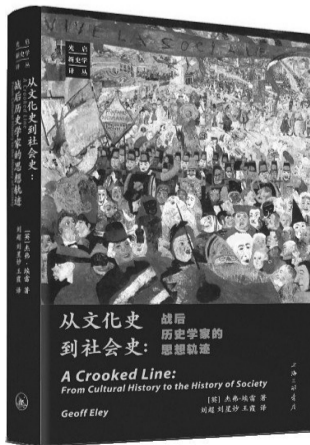
荐书

连接世界的桥



《每一座桥都连接着另一个世界》 商务印书馆

桥梁代表着沟通的渴望，正是这种连通使“桥”超越了物理形态，在不同领域衍生出多样含义，诗歌、电影乃至人类本身都可以成为“桥”。本书将“桥”的诗意与哲学维度纳入九大主题探讨，呈现了“桥”或“桥式”事物在建筑、神话、文学、艺术、历史、政治和哲学叙述等领域的丰富图景。



《从文化史到社会史：战后历史学家的思想轨迹》 上海三联书店

本书是德国史权威学者杰弗·埃雷对40年来西方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进行的全方位回顾。作者提出，二战后西方史学经历了由社会史到文化史的巨大转变。作者认为面对各种现实问题，有必要对社会史研究加以重新检讨，发掘其之于当下社会变革的应用价值。



《你的物品，是你的内心》 商务印书馆

你所拥有的物品，藏着你的过去，透露你的当下，也预示你的未来。本书以心理治疗师的视角，解释了物品与人的心理与潜意识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以物见人，以整理物品来疗愈、调整自我状态，走出误区，实现心灵的成长。对于自我认识、自我疗愈、心灵成长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阅此书。